

# 大河文心

■ 玄志刚

国家有国家的文化自信,如大河汤汤,有容乃大。

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地方的文化自信,如老树盘根,不喧哗,自有声。

聊城的文化自信,写在黄河艾山卡口,那最窄处,有最长的回响,是河水与时光的对峙;写在伊尹耕莘处,那第一缕药香,飘了五千年,熬煮着济世仁心;写在光岳楼的楼顶,那一只葫芦,盛着日月,装着满城的福气;写在海源阁的书页间,那一卷卷宋版,墨痕犹在,藏着文脉的流转;写在景阳冈的风里,那一声虎啸,穿过千年,喊出了一代代人的风骨。

音、药、福、文、气,便是聊城写给大河的回响。

全中国最好听的城市名字,聊城当之无愧。

“聊”字何意?《说文》解为“耳中鸣也”,是声音在耳畔回荡。这个名字,天生就带着音律的基因,仿佛千百年前黄河号子、运河小调、鱼山梵呗、高唐尺八、临清古筝,都在这一个字里汇合了。“城”字落地,把那些飘荡的声音收拢起来,聚成一方水土的灵魂。

“聊”字还有暂且、依赖、略微、闲谈等意思,更多用作聊天。蒲松龄将书房命名为“聊斋”,《聊斋志异》里的《胭脂》故事便发生在聊城。蒲松龄当年写《胭脂》故事,是骑着毛驴来到东昌府,在东昌湖边撷取素材后写成的。因此,东昌湖也被称为“胭脂湖”。

聊城把精心打造的区域农产品品牌,也加了一个“聊”字,叫作“聊·胜一筹!”。胜出别人,凭的是实实在在的品质;胜出自己,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用心。以建设全国优质农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为目标,聊城在服务全国“绿色大粮仓”“安全大厨房”上走在前,挑大梁,让“放心吃吧,聊城产的”成为掷地有声的信誉。

聊城有数百处名胜古迹,都能在中华古典文籍中找到相关的对应。朝鲜《漂海录》、日本《入明记》、意大利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和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、荷兰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、英国《乾隆英使觐见记》都记载了运河聊城的繁华盛景。

运河的桨声灯影,不过是聊城五千年文明长河中的一朵浪花。文明层层累积,如大河泥沙,沉淀出这座城深厚的河床。

## 黄河收窄处 音律始宽时

九曲黄河,自巴颜喀拉山启程,裹挟青藏高原的寒雪与黄土高原的泥沙,一路劈山夺路,咆哮万里。但黄河来到聊城东阿,在艾山脚下,收起了它的锋芒。

艾山卡口,宽仅二百七十五米,是黄河下游最窄处,水势被两岸挟持,流速湍急,左冲右突,如困兽,如烈马,如一个人被扼住了咽喉。

恰恰是这“逼”出来的激荡,让携带千里的泥沙有了片刻停留,不是沉淀,是顿悟。壶口是出征,卡口是收兵;壶口是少年问天,卡口是中年面壁。正因窄,才有了水与岸的相遇,万里风尘与一夕安顿的相遇,不是劈开,是绕行。

“秋观浪涌冬观冰,正月十六放河灯”。黄河鲤鱼跳卡口,艾山脚下锁蛟龙。”这首民谣,道出了艾山卡口水藏春的春秋。

可蛟龙真的是被锁住的吗?也许它只是累了,游了一万里,游过了峡谷与平原,游过了征战与盛世,终于在艾山脚下,遇见了那个窄窄的,只容一身的入口。它游进去,不再出来。

黄河在艾山收窄了河床,正如一个人在中年收窄了期待。河道愈窄,回声愈长。

在东阿王期间,曹植来得最多的地方,就是艾山卡口。那阳山下流淌的尚不是黄河,而是古济水演化而来的大清河。河道骤收,如

万马回旋,河水一次次撞向石壁,又一次次折身而返,不正是自己半生的写照?才名如滔天雪,功业却困于尺咫。七步成诗,却走不出冗长的阴影;胸怀天下,却终老于封地一隅。胸中万顷波涛,尽付这八十余丈的窄口。他久久伫立,衣袂尽湿,恍然觉得,这卡口收束的不是河流,而是自己无从安放的生命。

曹植生于乱世,长于军旅,那时的黄河是战鼓,是檄文,是父王的野心与天下。

可艾山不一样。这里没有金戈铁马,没有旌旗蔽日。只有水,日复一日地撞击石壁;只有岸,年复一年地收容流水。水在这里不是征服者,是归客。岸在这里不是屏障,是门楣。

曹植在卡口站了很久很久,久到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那一日,他离开卡口,沿河堤,登上鱼山。山中无浪,只有风吹过松枝的轻响,面前是大河熔金,身后是空山不语。

起初是寂静,天地阖目,万籁噤声。然后,有音自虚空来,不是自天而降,而是自心底升起;不是入耳,而是入骨。那声音冷冷如冰下暗泉,杳杳如云外钟声,分明是梵呗,却无一字可辨;分明是初闻,却恍若前生早已听过千百回。他闭目,泪先于意落。那一刻,他听懂的不是经文,是卡口的水,半生的浪,四十年来所有无从收束的奔流。

他取过简牍,记下那缕音律,笔落处,不是诗,不是赋,是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的梵梵汉韵。字字如莲,自唇齿间次第开落;音音如梵,中国佛教音乐自此开端。鱼山梵呗是完成汉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。

那一日鱼山上,他不过是个半生颠沛的王子,终于在最窄的河道之处,听见了属于自己的回响。不是收束,是化开;不是征服,是和解。他俯瞰这片土地,河声入松,松影覆石,心中涌起一种奇特的归属感,仿佛此地不是他宦游的驿站,而是迟来的故里。

这位终生不得归乡的游子,在生前便把鱼山选作了长眠之地。他并不知道,一千六百多年后,黄河从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,一路北上,夺大清河入海。他更不知道,自己长眠的鱼山,终有一天会矗立在黄河北岸。大河改道,竟是为这位才子守护千年。

曹植落在这世间的,不只七步成诗的叹息,更有一脉文脉的奠基。他将汉乐府的古朴化为五言的华茂,让诗歌从民间歌谣走进了文人士大夫的殿堂。从此,中国诗歌有了抒情品格,有了“骨气奇高,词彩华茂”的典范。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,子建独占八斗,那八斗,不只落在魏晋,更洒向盛唐,落在李白、王维的酒杯里。

李白来到了聊城,没有人确切知道他停留了多久,但他想必去了艾山和鱼山,和曹植来一场诗赋相约;想必去了在平博,和鲁仲连来一场心灵相惜。李白一生崇拜鲁仲连,近乎执念,存世诗作九百余首,提及鲁仲连多达近二十次,频率远超其他历史人物。这不是偶然的“用典”,而是反复的“签名”,他用鲁仲连的名字,一笔一画签下自己的精神契约。

李白在《别鲁颂》中说,泰山再高,也比不上鲁仲连的高风亮节;人再多,也要败在鲁仲连的三寸舌下。在《古风·齐有倜傥生》中,李白这样写道:“齐有倜傥生,鲁连特高妙。明月出海底,一朝开光耀。却秦振英声,后世仰未照。意轻千金赠,顾向平原笑。吾亦渔父人,拂衣可同调。”李白的诗眼,就在这一“笑”字,不是得意的笑,不是嘲讽的笑,是看淡的笑,是放下之后眉目舒展的笑。在聊城,李白也找到了精神归宿。

聊城的音律脉路,并未止于曹植与李白。唐初,一位真正的音律大师从这片土地上走出来。他叫吕才,聊城高唐县清平镇吕庄人。这位奇才,在音律领域的贡献,足以让聊城配得上“音律之乡”的称号。

唐贞观年间,太宗令祖孝孙修订乐律,祖孝孙与乐师们反复争辩,始终不得定论。太宗下诏遍访能者,中书令温彦博推荐吕才,称其“聪明多能,尤长于声乐”。魏征也盛赞其才:“尺八长短不同,各应律管,无不谐韵。”

高唐城外有座古墓,埋着春秋时的齐国人缩胸。缩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“国家级”歌星。《孟子》中有明确记载:“缩胸处于高唐,而齐右善歌。”因他居住在高唐,整个齐国西部的人都变得擅长唱歌,连国民俗都为之改变。缩胸传唱的民歌被孔子收入《诗经·齐风》中,他被后世尊为十二“音神”之一,名号“琴音缩胸”。那座墓,吕才去过,风吹过来,荒草窸窣窸窣地响,或许他听见了什么。

吕才更大的功绩,在于他参与编创的两部大型乐舞,《秦王破阵乐》和《功成庆舞》。贞观七年(公元633年),太宗亲绘《破阵舞图》,命吕才依图教乐工一百二十人,披甲执戟而习之。这个舞蹈“有往来击刺之象,以应歌曲”,气势恢宏,震动朝野。千百年来,《秦王破阵乐》被史学界、音乐界视为“国宝”。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均为吕才列传。

吕才之后,又一千余年,聊城临清金郝庄,再出一位音律大家金灼南。

金灼南生于1882年,出身音乐世家,自幼习琴,青年时奔走江南数省,寻师访友,集众家之长,终成一家,世称“金派”。他将家乡流传的传统琴曲《双板》《三环套日》《流水激石》融合编创,命名为《渔舟唱晚》。这支曲子,后来成为古筝界公认的“第一名曲”。1984年,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采用电子琴演奏的《渔舟唱晚》,作为背景音乐。每天傍晚,当那悠扬的旋律响起,亿万观众并不知道,这支曲子的根,流淌着聊城的乡音。

如今,金郝庄的村民们,仍在传唱祖辈的

技艺,那一声声古筝,一直传到今天。

聊城这片土地上,音律的脉络绵延两千余年,从未断绝。黄河在艾山脚下收窄了河床,却在聊城人的血脉里,化作另一种流淌。那不是水的奔涌,是音的绵延;不是力的冲撞,是韵的回响。

卡口窄处,蛟龙沉潜。那一缕缕梵呗,一声声尺八,一阵阵古筝,正是这条沉在河底的蛟龙,吐出的千古绝响。

## 伊尹耕莘处 药香始渡时

音律从来不只是音律,五音入五脏,音乐本身就是一剂药,能调和气血,能安神定志。和音律一样,要寻找中医药文化的源头,那得走进莘县那一望无际的旷野里去,走到“莘亭伊尹耕处”的石碑前。

伊尹是谁?他是厨子,是宰相,是帝王之师,更是中医药汤液的鼻祖。伊尹最了不起的地方,在于他看懂了“水火”的秘密。他发现,同样的食材,水多火少,火急火缓,出来的味道天差地别;同样的草药,单嚼独咽,与合煎共煮,效力不可同日而语。

于是,他把厨房里的炊具,搬进了药房。

在此之前,先民用药,叫做“咬咀”,把草根树皮嚼碎了吞下去,或者切碎了硬咽。药是药,人是人,两不相入。伊尹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,他把几味药放在一起,加水,生火,煎煮,让它们在水的浸润和火的煎熬里,彼此渗透,彼此成就。酸、苦、甘、辛、咸,各司其职,又浑然一体,他取了一个名字,叫“汤液”。

这是医学史上的一次革命,神农尝百草,解决了“用什么药”;伊尹创汤液,开创了“怎么用药”。从此,药材不再是草根树皮的简单堆叠,而被赋予了灵魂,方剂诞生了。

伊尹用鼎煮药,不仅观察药性的寒热,更思考药物之间的君臣佐使关系。酸入肝,能收敛;苦入心,能泄降;甘入脾,能补缓;辛入肺,能发散;咸入肾,能软坚。“五味调和以养五脏”的学说,如同一盏明灯,不仅照亮了后世中医药发展的道路,也奠定了“药食同源”的基石。它告诉人们,日常的饮食,其实就是最好的医药,通过对食物性味的精心搭配和调和,就可以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,达到调和气血、平衡阴阳、防病治病的目的。

厨房与药房之间,伊尹只轻轻跨过去一道门楣,却为华夏文明推开了一扇大门,完成了从“食”到“药”的伟大跨越。

在同一片土地上,从莘县往北,在临清八岔路潘店村,矗立着一座彭祖墓。中华养生鼻祖彭祖探索着更为根本的命题,如何不药而养生,尽享天年,如何把厨房里的膳食,变成通往长寿的秘钥。他所开创的,不是治病的方法,而是活着的智慧。

关于彭祖活到八百岁的说法,民间流传着众多故事,有人说他精通厨艺,一碗鸡汤博得玉帝欢心,赐八百年寿命;也有人说他托人从阎罗王的生死簿上撕下了自己的名字,得以长生不老。尽管这些传说带有神话色彩,但八百岁其实是按“小花甲”的方法来记岁的,一年相当于现在的六十天。这样算来,彭祖活到了一百三十多岁。彭祖代表了中华养生文化的源头,倡导的是“导引、调息、膳食、养生”四位一体的生命哲学,追求的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长度。

伊尹在探寻百草与人体共鸣的奥秘时,想必去过彭祖的安息之地,感念这位先哲以食养生的智慧。或许正是这次跨越时空的“对话”,让他更加坚信药食同源、医食同理。

彭祖明其道,伊尹得其法,两位先贤在聊城这片土地上,共同为后世铺就了一条从治病到养生,从药房到厨房的康庄大道。

两千多年的时光里,汤液的香气从未消散。这一切,只为等待一个人的到来。

在平人成无己,金代医学大家。他最伟大的贡献,是首创“以经释论”的方法,运用《黄帝内经》《难经》等古典医籍,逐条阐释张仲景《伤寒论》的条文与方剂,完成《注解伤寒论》这一经典医书。在此之前,《伤寒论》是一本“怎么治”的方书;在此之后,《伤寒论》成了一门“为什么这么治”的学问。他第一次明确提出“半表半里”的证治纲领,第一次系统阐述“和法”的理论内涵,第一次运用“君臣佐使”逐方解析仲景方剂之妙。他被后世尊为“国医亚圣”,与医圣张仲景并立杏坛,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

成无己的伟大,还在于“无己”。他以儒医立身,无论贫富贵贱,对求诊者一视同仁,号脉必凝神静气,处方必反复斟酌。对无力支付药费的,无偿施药;对远道求医的,舍粥留宿。即便是在清康之后,他被当作战利品掠往金国,备受凌辱的漫长岁月里,仍以仁德为天职,既救治宋人,也为金人疗伤。孔子说“仁者寿”,成无己活到了九十三岁,这不是奇迹,这是中医养生智慧的实证。

从彭祖的膳食,到伊尹的汤液,再到成无己的注解,聊城这片土地始终与中医药的命脉紧紧相连。如果说彭祖是滋养的沃土,伊尹是源头的活水,那么成无己便是那个引水成渠的人,让上古的智慧,得以顺畅地流淌进每一个后世医者的心中。

到了今天,这条流淌了五千多年的中医药长河,在聊城这片土地上,正奔涌出新的波澜。当古老的智慧遇见时代的呼唤,聊城人正让中医药从历史走向未来,从中国走向世界。这一次的主角,不再是某一位先贤,而是这片土地孕育的阿胶、灵芝、桑黄。

阿胶、灵芝、桑黄都是聊城产的道地药材,有着补血、和血、止血的奇效。中国最早的中药学专著《神农本草经》对阿胶的记载是“主心腹内崩……久服益气”;对灵芝的功效按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、紫六芝进行了详细分类记载;对桑黄的描述是“属上经,性微寒,无毒,久服轻身,不老延年”。作为中医“上品”“君药”,阿胶、灵芝、桑黄都有着养身、养心、养颜的功效,是聊城人引以为傲的“聊城新三宝”。

“新三宝”之所以好,根子在水。东阿阿胶的独一无二,离不开泰山与太行山两股地下水,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:“其水清而重,其性趋下。”中科院检测也证实,这水为天然弱碱性,富含数十种矿物质与微量元素,熬胶时能助杂质分离,让药效倍增。冠县灵芝长在黄河故道的沙土地上,那疏松透气的沙质土壤,正是灵芝菌丝最爱的温床。临清桑黄长在黄河故道的古桑树上,泥沙千年的淤积,为桑黄提供了最理想的宿主。阿胶得水之重,灵芝得土之松,桑黄得木之古,这三样宝物,说到底,都是大河留给聊城的馈赠。

寿人济世,道正声崇。从郑和宝船载着阿胶七下西洋,到今天“聊城新三宝”远销世界,聊城这片土地,始终在做好一件事:让中医药的智慧,生生不息。

阿胶之城,灵芝之乡,桑黄之都,为聊城振兴中医药事业,打开了无限的空间。

像大河的发源地一样,不必是高原上那滴最初的水珠,能让无数支流汇聚、交融、奔涌向海的地方,便是文明最辽阔的发源地。

那伊尹耕莘处的第一缕药香,从此处启程,穿越五千年的渡口,正在抵达更远的远方。

## 光岳凌霄处 福脉绵延时

光岳楼的飞檐挑起鲁西平原的天际线,已超过了六百五十年。楼顶上悬着的那只葫芦,不是装饰,是真切切切长成、晒干、烙了花纹的东昌葫芦。

葫芦,是聊城吉祥文化的一把钥匙。它肚子里装着的,不只是一方水土的福祿祈愿,更是一条绵绵延延的福脉,从堂邑的葫芦架下,游过高唐的锦鲤池,穿过张秋的年画店,剪过在平的窗花,最后落在东阿喜鹊的喳喳声里。光岳楼,这鲁西大地上最高的坐标,恰是这脉福气世代相传的高台。

从光岳楼经聊堂路,西行四十里,是堂邑镇路庄村。还未进村,葫芦的香气已扑了满怀,那是来自西域,把葫芦种子带到中原,在堂邑扎下了根。黄河改道留下的冲积土,疏松透气,排水性好,最宜葫芦扎根。老辈人传下话:“葫芦不挑地,但挑水,水若甜,葫芦才灵。”路庄人打井取水,井水清冽,浇出的葫芦皮薄肉厚,筋骨匀称,天生就是雕刻的好胚子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葫芦因其独特的形态和音韵,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吉祥寓意。

葫芦谐音“福祿”,给人们带来福祿吉祥之意;葫芦多枝蔓,寓意“福祿万年”;葫芦内多子,表示“多子多福”。正因为这些美好寓意,葫芦被视为吉祥物,被称为“吉祥葫芦”。

葫芦天生一副乾坤相,圆腹为坤,藤蔓为乾,暗合阴阳。壶公悬壶济世,铁拐李葫芦装天,“壶中天地”四字,把这小物件里的大学问说尽了。可在路庄人眼里,那些大道理都远,近的是日子,锁着的葫芦画上符,悬在门楣上;护身的葫芦系在腰间,跟着人出行;招财的葫芦刻着铜钱纹,摆在柜台上。“符器合一”,福气便从天上落进了人间。

东昌葫芦不仅种植规模大,而且最讲究雕刻技法,以“刻”为骨,金石铿锵,以“意”为魂,吉祥万千,以“形”为韵,随形赋意,“工”与“意”结合,“俗”与“雅”共融,“古”与“今”对话,将聊城的水土灵气、齐鲁的文化底蕴,一同刻入了这“福祿”之中。东昌葫芦,有丝绸之路上民族交往、文化互鉴的鲜活踪影,有中华文化的韧性与活力,有传统与现代的美妙融合,有新时代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。东昌府区被命名为“中国葫芦雕刻文化艺术之乡”,在全国率先发布东昌葫芦发展指数,引领着葫芦产业的发展方向。

大河拐弯处,必有圣人出。马颊河在聊城北边拐了个弯,仿佛故意要耽搁一会儿,好把天上的云彩,岸边的花香都看得真切些。那水汽氤氲间,仿佛有什么东西沉淀下来,沉到土里,沉到人的血脉里,再化开时,便成了纸上的墨、笔端的韵。这里,便是中国书画艺术之乡——高唐。

这墨韵一化开,便收不住了。近现代画坛,李苦禅、孙大千两位大师皆出于高唐。李苦禅先生是齐白石入室弟子,以大写意花鸟名世,笔墨雄阔,气势磅礴,被称为“画坛宗匠”。孙大千先生也是山水画巨匠,晚年将毕生创作与收藏尽数捐给家乡。李奇茂,台湾水墨画大师,被誉为“当代张大千”,将高唐视为“第二故乡”和精神归属地。2012年,高唐县被文化部和国家台办联合命名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。

人居四海,心在高唐。高唐县城不大,最好的地方,都给了那些与书画结缘的人。李苦禅、孙大千、李奇茂、尹德春、程辛木、辛守庆……近年又新添了韩静霆、张望,他们的美术馆静立在湖光水色之间,青砖灰瓦,仿佛那

河水拐弯时打的一个盹儿,梦里全是墨香,醒来时,香已满城。

在高唐,不只湖畔馆舍里藏着书香,乡野之间,也藏着一群握惯了锄头,更放不下画笔的人。三十里铺镇大石新村,把写意花鸟技法融进秸秆画里,让庄稼地里的麦秸登上了国家艺术殿堂。琉璃寺镇秦庄村,是锦鲤绘画专业村,村民们的画卖到了北京。

高唐的祥瑞,自古便与锦鲤连在一起。千年之前,马颊河上便有渔人吟唱“鸣榔得锦鲤”,那诗句藏在《高唐州志》的泛黄纸页里,如同鱼藏在春水里,静待来日。

这锦鲤,从书画里游出来,从诗里游出来,先是游进了四十多家企业、八千亩池塘,游出了十亿元的光景;再一摆尾,便游出了国门,游到了阿联酋的迪拜。如今,高唐是“中国锦鲤第一县”,是“中国锦鲤之都”。那锦鲤还在游,成了动漫界上的“唐小鲤”,成了向全球发布的产业指数。它游到哪里,高唐的名字就跟到哪里。

运河从南边来,带着江南的温润;往北边去,载着北国的厚重。走到张秋这地方,深着镇子拐了几个弯,也把一个镇子的命运,深深地嵌进了历史的河道里。

明清时候,这里可了不得。张秋虽是个镇,却有府城的地位,城里头设有工部都水司、管河厅、布政司署、税课局,有七十二趟街、八十二胡同。民间有句话,叫“南有苏杭,北有临张”。这“临”是临清,“张”便是张秋,有一个镇子,能与苏杭并称,可以想见当年的繁华。

这繁华,养出了许多手艺。其中一样,便是木版年画。张秋的年画是从山西传来的,晋商把生意做到了山东,也把家乡的年画带到了。到了明清,这手艺便在这儿扎下了根,开出了花。

张秋の木版年画,有它独特的脾性。别的年画,印完了还要用手给人物脸上添些颜色,叫作“开脸”。杨柳青的娃娃是这样,杨家埠的门神也是这样。张秋的年画却不,只套色,不手绘,一张画,要套印五回,少一回都不行。

张秋匠人,见过世面,有自己的吉祥观。他们信吉祥是要靠画出来的,倒觉得真正的福气,就该像那白净净的脸,要留白,要稳当地藏在心里。外头再热闹,也不往脸上贴金;心里再有盼头,也不溢于言表。那门神秦琼敬德,执鞭跨马,威风凛凛,脸上却不着一色,白净净地贴着门板。年画里藏着运河人家对日子的笃定,福气无须张扬,安稳自在心中。

后来,张秋镇“刘振升画店”迁往东昌府府孝街,由此带动了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兴盛。一样的吉祥,张秋人把它藏在套色的木板里,在平人却把它剪成滴露的,在平剪纸,是不打草稿的,心意随意,动剪成形,在技法上多为“开口剪”,剪的时候不用剪刀插孔,直接从纸的一侧入剪刀。剪完之后,看起来零零散散,铺在桌子上,依然是一幅完整的图案。经过世代传承,在平剪纸形成了简练质朴、造型夸张、装饰性强、含蓄内敛的风格,红彤彤的,照得满屋都是喜气。

黄河改道,引黄淤沙,给东阿留下沙土地。东阿人不信邪,在沙地上种树,一棵一棵,一片一片,硬是用十几万亩人工把黄沙锁进了绿网。硬是长起来了,长得最多的图案。那黑白相间的身影,从这一片林跳到那一片林,喳喳的叫声把寂静的沙地叫活了。如今全县有二十多万只喜鹊,是全国唯一的“中国喜鹊之乡”。

喜鹊来了,吉祥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。在东阿,县里明文规定,凡筑有喜鹊鸟巢的树,禁伐。两万多棵带巢的树,一棵一棵挂上牌保护;沿黄湿地上,数千个人工鸟巢次第悬挂。这背后,是一种朴素的认知,吉祥是需要安居的,安居是需要呵护的。

那些挂牌保护的树,那些悬挂的人工巢,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生产,它们生产生态,生产景观,生产一个地方的辨识度。野鸭、白鹭、灰鹤、天鹅来了,连珍稀的震旦鸦雀也重现身影。鸟多了,来看鸟的人就多了;人来了,周边的农家乐、生态园、民宿便跟着火起来了。喜鹊不再只是枝头的吉祥,它成了乡村旅游的“代言人”,成了农产品的“形象大使”,成了电商平台东阿阿胶、黄河大鲤鱼包装上的那一抹灵动。

聊城人懂得这个道理,真正的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遗产,是活在当下的创造。吉祥文化之所以珍贵,不在于它有多古老、多悠久,而在于它还能生长、还能结果、还能让土地上的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只有让它生根,让它与生产结合,与产业结合,它才能活起来,才能成为真正的“幸福产业”。

这幸福,是看得见的,在丰收的庄稼地里,在游客的笑脸上,在锦鲤跃出水面的那一刻,在樱桃入口的瞬间,在桑黄茶氤氲的热气里。幸福就藏在这些寻常却动人的瞬间里,藏在吉祥文化与产业结合的每一个细节里。

吉祥就这样一圈一圈地扩散,从文化符号扩散为生态红利,再扩散为经济收益。如今,鲁西平原正经历着一场重塑,一场以“片区”为笔,以“振兴”为墨的宏大叙事,正在千里沃野上,徐徐绘就一幅名为“从一村富到连片兴”“从一域美到全域美”的乡村振兴画卷。

光岳楼高耸在平原之上,也挑起了这一方水土的万千气象。它看着脚下的土地从黄河故道变成绿洲,从沙化之地变成福乡。那只悬在楼顶的东昌葫芦,日夜转动,像是在为这满城的吉祥,做一个永恒的见证。